

● 解放军艺术学院丛书

● 学术卷 (1)

艺苑撷英

——1992年获奖论文集

解放军出版社

解放军艺术学院丛书

学术卷（I）

艺苑撷英

1992年获奖论文集

京新登字 117 号

艺苑撷英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宏伟胶印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47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 (北京)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 5065 2041 9/J · 33

定价: 7.00 元

序

傅庚辰

记得前年深秋,大约正是播种来年春麦的时节,我院决定开展首届学术论文征集与评奖活动。紧接着,随着一系列运作,其间真象农人劳力那样,每个环节都付出了艰辛。经过一年多的生长期,现在,当我们漫步艺苑欣赏收获的时候,满眼已是硕果累累,繁花似锦了。果实的丰盈和丰产的面积之大,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和想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次学术活动,在院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全院同志的努力下,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开展学术理论研究是院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院校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如果说,我们把院校出人才出成绩喻为果实的话,那么这果实的大小和质量与学术理论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联系。俗话说,根深才能叶茂,叶茂才显得生机勃勃,出类拔萃。因此,我们抓住了学术理论研究,就是抓住了教育的根本,抓住了院校建设的关键性问题。在开展这次学术活动期间,中央发表了小平同志的南巡重要谈话,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恰逢其时,我们这样做既是贯彻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十四大精神的实际行动,也是为院校调整改革后我院进一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把教育质量推向一个新阶段的思想理论准备。

这次征集共收到 46 人 59 篇约 82 万字的论文。论文作者既有长期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又有崭露头角年富力强的

中青年教师；既有院系室的领导同志，又有机关的一般干部。论文内容也非常丰富，按学科划分为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文化工作、共同课（政治教育）等七大类，涉及到学院各专业学科和院校教育与管理的各个领域。这些论文都是从院校建设和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既有对我院专业教学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有新时期的新情况、新矛盾的揭示；既有各学科专业教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又有各艺术门类创作表演技术技巧训练的探索；既有对建设有军队特点的艺术教育体系的总体勾划，又有对实现这一体系的途径的具体分析。这些论文可以说是五彩缤纷。而本书所选的 22 篇论文更是其中的精粹，它是经过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和诸多评委多次筛选比较才评出来的，说这是艺苑撷英，不为过份。

《艺苑撷英》就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就象一枝红杏出墙，它的一切，将由世人评说，由不得我们自己给它下结论，但看到它摇曳枝头的样子，仍不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它毕竟是我们军艺多年教学的结晶，其中凝聚着我们的几多心血和汗水，因此就象送孩子远行，让人离情依依。当然，《艺苑撷英》还有不尽人意处，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应当努力改进的。虽然这本书是我们军艺首届学术论文评选的结晶，但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还要继续开展下去，这样我们就会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1993 年 1 月

目 录

序	傅庚辰(1)
寻找“合点”： 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	朱向前(1)
论中国当代文学流派	张志忠(17)
在实践中探索 ——论话剧专业的戏曲表演课教学	陈文远(46)
素描教学问题	刘天呈(56)
关于舞蹈教学发展的思索	王振新(66)
中国人物小品画的创作规律与技法研究	刘大为(100)
再论舞蹈艺术中的文学审美因素	高椿生(116)
舞蹈教学思维琐记	李庆宁(130)
略论戏剧系大专班的形体课教学	马桂茹(141)
略论党领导下的文艺队伍在抗日战争中的 成长及其贡献	靳希光(150)

论战史文学

——关于军事文学创新突破的思考 邢军纪(167)

1991:军艺作家群小说创作走向新探 黄献国(179)

军队艺术教育科学体系浅议 刘云生(191)

关于声乐演唱中内容与形式的思考

——从高尔基评论夏利亚平演唱

《跳蚤之歌》谈起 杨比德(205)

生活、哲理、诗情与美的形式

——试论话剧《桑树坪纪事》的导演艺术 王 敏(209)

从巴托克的《乐队协奏曲》看他的音乐风格

..... 康 澎(224)

好的演奏来源于正确的认识

——演奏巴赫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探析 唐一道(239)

论参加体育运动增强体质的生理机制 张润兰(244)

“《红太阳》热”中的理论思考 周荫昌(261)

商品经济与对外开放 孔晓玉(272)

戏剧艺术思维的基本规律 冯继唐(279)

外出写生技法十讲 崔开玺(288)

寻找“合点”： 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

朱 向 前

一个醒目的军事文学现象长期为人们习焉不察——在新时期军旅文坛上特别活跃着两类青年作家：一类出生于军人家庭，如朱苏进、刘亚洲、乔良、海波、钱刚、简嘉等（实际上还包括绝大部分女青年军旅作家，如何晓鲁、刘宏伟、王海翎、丁小琦、庞天舒等）；一类出生于农民家庭，如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唐栋、雷铎、周大新、陈道阔等。这种现象究竟包蕴了什么样的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呢？本文即试图从他们不同的身世经历入手，主要取社会心理（上篇）和文化心理（下篇）两个角度切进，力求客观公允地通过两类作家的比较研究，来寻找他们各自的特点，进而涉及到军事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重要课题——中国军人的心理基础和军事文学的文化背景的初步探讨。

上 篇

广义而言，历史而言，我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数千年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农民的战争。本世纪上半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也是一场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人民军队的主要成分也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农民。所谓出身农民家庭的青年军旅作家，一般都是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参军前就是地道的农民（李存葆初中毕业、莫言高小辍学、宋学武高中毕业后务农）。而所谓出身军人家庭的青年军旅作家，虽然都是生于军营，长于军营，尔后穿上父辈的军装，但实质上也大多是农民后裔，上溯到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也差不多都是农民了。——和农民或亲或疏的血缘联系，是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共同之处，这也是由中国革命和中国军队的特点与性质所命定的。然而，一个是出生于直接的农民家庭，一个是间接的农民家庭，这就有了差异，这就使得他们象军事文学大树上长出来的相距很远的两根枝桠。

我认为，基本的差异就在于军人家庭和农民家庭其政治地位、经济条件、文化教养、生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并由此决定着他们相异的个人际遇和各别的情感世界等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观点，这种种不同势必深刻而久远地作用于他们的创作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我想在这儿简要提示的是，从作家生成学和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应该特别重视童年生活对一个作家心理的深刻影响。苏联作家兼批评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作家的创作实际上从童年就开始了，“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世界对我们来说和成年时代不同。……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的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①。事实上，直接以自己童少年生活为蓝本创作而成的世界名著就颇为不少，如俄苏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英国劳伦斯的《儿子和情人》，以及中国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

那么就让我们对这两类作家作一个粗略考察吧。——他们一般都在建国前后出生（上限到李存葆，1946年；下限到莫言，1956年），在童年、少年或青年前期，都或深或浅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里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两类作家虽然都经过了这场浩劫，却未能从中获取更引人注目的文学建树。这指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一是新时期十年迄今，他们还少有直接而深刻反映文革动乱的扛鼎之

作；二是军队既没有出现“知青作家群落”，甚至也没有一个象张承志、阿城、韩少功、王安忆、史铁生这样以反映知青生活见长的作家。原因何在？这不能不归结到家庭所造成他们个人在文革中颇为特别的遭际。

由于人民解放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文革中的军队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在当时中国社会翻云覆雨的政治风暴中，比较地方干部、知识分子乃至一般工人、城市居民来说，军队干部家庭的保险系数还是大的（少数高级领导除外）。子女们也因此多幸免厄运。当稍后的“上山下乡”大潮席卷全国之时，他们又纷纷捷足先登，未及成年便少小从军，远离了痛苦旋涡。至于农民（主要指贫下中农）家庭所受到的文革波及就更见其微小了，他们的子弟更多是中断学业回乡种地（注意：“回乡”与“下乡”简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回到了“原来的世界”，后者是进入了“新的世界”）。总观起来，文化革命的狂涛和上山下乡的巨潮，一般来说，对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家庭和个人的冲击都是相对间接、相对温和的。所以，他们未能在直接反映文革动乱和知青生活两个方面问鼎新时期文坛，实在也是理固宜然。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不写什么（文革和知青），并不等于他们不约而同地写什么，甚至相反。下面，我就先从不同的人物世界入手，来审测他们不同的文学世界。

如前所述，突如其来的政治动乱使多数当时正值少年的军人子弟过早地结束了充满憧憬的梦幻时代（刘亚洲 15 岁，朱苏进、钱刚、简嘉等 16 岁入伍），庄严的草绿军装几乎逼迫他们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从“摇篮”意义的军营走进人生意义的军营，一方面固然有助于强化他们对军人的理解和感情并使自己加速成为真正的军人，另一方面却也局限了他们的生活视域，造成了他们人生经验的“一元化”。此外，学业荒废导致中等教育的空白，又使他们的智力开发畸形拓进，知识结构较为偏仄。这就宿命般地规定了他们日后创作的题材和人物取向：军人→军人→军人。从《射天狼》一直到《第三只眼》，朱苏进基本上给我们展览了一个纯粹的军人画廊。简

嘉以《女炊事班长》为发端，从士兵写到“士官”，如今正忘情吹奏着《青年军官进行曲》。比照起来，刘亚洲笔下的人物包容性更大一些，他在大力抒写“两代风流”的同时，还把笔触伸出国界，但国界那边也是一个个凶悍强猛的军人——从职业杀手“红色旅”到中东“恶魔”沙龙。

与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少年从军相映成趣的是，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从军年龄往往偏大（宋学武 22 岁，莫言、雷铎 20 岁等）。这就从客观上玉成了他们更为丰富的社会阅历（莫言当过临时工，唐栋当过小学教师，陈道阔当过公社团委书记等）。使他们至少具有了两个经验世界：一个是社会的（以农村为主），一个是军营的。因此他们多是“脚踩两只船”，一支笔又写军人，又写农人，而且往往把农人写得更生动——莫言自《红萝卜》到《红高粱》、《红蝗》，一直以写农人为主自不待言；宋学武一边经营他的南线“战争心态小说”，一边又念念不忘他的“嗑巴舅舅”和“大青哥”们（《干草》《罩鱼》）；《野草闲花》系列中那一群鲜活孟浪的江汉女子简直使陈道阔笔下的全部军人黯然失色。就是直面战争的《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奉献出来的最感人形象似乎也还是来自沂蒙山区的梁大娘和韩玉秀，而小说的重要主旨用作者的话来说则不是别的，正是“人民——上帝”！

熟识农人而多写农人，这对他们说实乃顺理成章之事。问题的反面是，对职业军人的理解与沟通，他们就难以达到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那样的深致与直捷——他们既没有朱苏进笔下那样纯的“兵味”，也不能象乔良、钱刚那般迅捷地推出具有现代战争观念、军事学识和指挥素质的新型指挥员“雷特”（《雷，在峡谷中回响》）与“蓝军司令”们。——反之亦然，当乔良笔下第一次出现一个南方山区的农民时（《灵旗》），生活和情感体验的匮乏就使得这个农民——“青果老爹”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意象存在，而非人物的树立。

是的，人物世界的不同仅仅是外部形态的差异，更有意义的恐

怕是从两类作家笔下相同的人物——军人的内在组构上，来开掘他们双方各自对军人所寄寓的不同的感情思考、价值判断、理想设计等等。

父辈血统的遗传，军营摇篮的熏陶，可塑性极强的年龄，和入伍的特定历史环境，使军人家庭的后裔们迅速适应了部队的艰苦生活，并在摸爬滚打的砥砺中开始体味军人的艰辛，在钢铁条律的钳缚中冶炼军人的气质，在把高山般的功劳铺得又平又远的奉献道路上咀嚼军人生涯的价值。——他们认定只有在这国防绿中才能找到童年的梦想——生长于斯，风流于斯。简嘉借他的人物之口热情煽动：“小伙子，穿军装吧！……干得好，营长、团长、师长、将军就是你的未来……”（《士官生》），朱苏进则把“我要当将军”五个大字刻在每个人物的骨子里。他们由此产生热爱，象农民眷恋土地般眷恋绿色的营盘，象“数学家爱古怪方程式般地热爱手中的武器”（《射天狼》）。因此，刘亚洲在赞唱“两代风流”时激情如瀑，钱刚在讴歌“蓝军司令”时豪气似虹，海波能把一张冷冰冰的“铁床”写成有体温有个性的活物，简嘉则在最普遍平凡的军旅生活中发现永恒的“绿色幽默”，更有朱苏进将对连队生活精确入微的观察，冷隽深沉的思考和怦然大跳的爱心一齐溶入笔端——《射天狼》里那一段对枯燥干巴的队列动作的富于神韵的描写，几乎成了人人激赏的经典性文字。他们心目中的战争使命高于一切，为战争的来临和最终消灭而厉兵秣马，枕戈待旦。一个个胸藏韬略，身怀绝技，即便在日常生活和平时训练中的举手投足，也无不符合战时规范，表现出优良深厚的军人的素养。一旦上了战场就更是如鱼得水，哪怕没有建立殊勋的壮烈之举，也会有意无意地展示一种技艺，一种胸襟，一种风度。——他们都深知自己是合格的职业军人，也因此而“傲”气冲天，更因此对那些非职业军人的种种失缺如眼睛里容不得沙粒一样不堪忍受——譬如对某些农村战士的种种陋习、毛病，便常常具有异样锐利的“第三只眼”，深、准、狠地一一发现，并带着一种优越感居高临下地给以尖利讥刺或暴览。相反，对职业军人的

某些短缺却予以宽容，视而不见乃至欣赏、玩味。同样的“第三只眼”投射在南骁珀身上就比投射在李海仓、宋庚石身上要温和得多。

选择军职作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在现今我国毕竟还少，尤其对广大农村战士来说，应征入伍不过是一方面尽义务保家卫国，二方面碰碰改换命运的机遇。总之，是作为人生的一段插曲来对待的。这与数千年小农经济的心理积淀直接有关。譬如农业文化所决定的农民土地观念，经过几千年的“土地革命”（从农民起义的“均田”口号一直到我党我军“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诸运动），不断得到强化。他们参军的出发点是土地，最终归宿亦是土地：解甲归田。所以，他们在感情上不大容易对军人职业产生亲和力，相反倒容易滋蔓排斥力——当然，这还由于他们从农村带来的自由散漫的生活作风，得过且过的人生哲学，和斤斤计较的处世态度等等，都与部队的钢铁纪律、昂扬斗志和不无军事共产主义色彩和生活方式等等的格格不入。他们即便穿上了军装，心里都依然种着一缕洋溢着小农意识的温情脉脉的梦想。他们表面上可能俨然一个十足的军人，骨子里却更可能接近一个地道的传统农民。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应该对他们有着较为切近真实的摹写。

勤劳、朴实、坚韧、顽强，如牛负重却任劳任怨，忠心奉献却不计报偿，可以一边藏着“欠帐单”一边血洒疆场。这是一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精神的崇尚，一种“战士万岁”的英雄主义的呼喊——李存葆笔下的军人，多是这种革命农民形象的写真。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的种种折光加以凝聚和放大，加以提扬和净化，以道德伦理的力量感化人，教育人，催人泪下，激人奋发（在唐栋、周大新等人的作品中，也常常可以看到这种努力）。李存葆的作品洋溢着一种优秀农民的自豪感。与李存葆遥遥对应的是站在另一极的莫言，他对农民军人身上的“优根性”照样喝赞，对其劣根性也不想有所讳言，更不愿加以美化，他总是和盘托出，鱼龙混杂，

同一个人物身上往往兼有善恶两面甚至多面。而且他还似乎有“审丑”癖好，对其“劣根”的描述不遗余力乃至夸张漫画——指导员孙天球表内不一心理矛盾，用望远镜偷看雕塑裸女成癖，以至被战士捉弄，大出洋相（《金发婴儿》）；余占鳌们“精忠报国”又“杀人越货”（《红高粱》）；《苍蝇·门牙》极尽暴览荒唐人事之技能等等。从中我们不难咀嚼到莫言心中那种农民自卑心理的凄凉和自我嘲讽的快意。宋学武似乎处于李存葆和莫言之间——对于提炼农民军人身上的传统美德，他缺乏李存葆那样的热情，而对于农民军人心中的历史陈垢，他又比莫言更能宽容，因此，他比较持平地写出了本真农民式的军人形象——当将军的梦想同样不属于他们，坚守阵地的连长负伤临终前神往的不是鲜花和勋章，而是恬静温馨的农家小院——颇有点“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意味（《心慰》）；两个在前沿担任警戒的战士关心的不是毙敌立功，而是想家或者盼望头顶上有一片小小的荫凉（《山上山下》）——他们大都忠厚本份，却又不乏农民的狡猾和幽默；他们有时也精于算计，更多的时候却表现出一种达观——“这样可以，那样也行，或许更好些”——从《山上山下》、《这边那边》、《洞里洞外》的题目中似乎也透射出些许宋学武式的农民辩证法的智慧。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是宋学武笔下农民军人的生活哲学。

认真检视李存葆、莫言、宋学武以及他们的同类作家，将不难发见，他们艺术心灵的触须对职业军人多少有点迟钝，有点“隔”，而更钟情于农民军人。可又正由于他们每一个典型人物的背后都站着千千万万农民军人（尽管近年我军兵员构成略有嬗变，但农村兵源还占主流），和积淀着广袤深厚的农民阶级的“集体无意识”，所以作品往往能比较真实地反映部队的诸多重要方面，并引起广泛的理解与共鸣。这是理所当然的，又是值得警醒的。

我的小结将强调指出双方的局限所在——

由于过分地强化军人意识，或忽略民族心理（主要是农民心理）素质的溶渗；过分地凸出当代意识，或不善于以历史眼光（“历

史的意义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②。来观照当代军人,就容易使得军人家庭青年军旅作家给他们所钟情的“职业军人”头上戴上虚幻的理想化光圈。再加上对外国军事文学借鉴的不够节制,又渐次滋生了一种“洋化”倾向,而把某些表层次的现代生活方式、外部特征当作传统心理嬗变或观念更新来大加吹涨。这样就不仅局促了他们笔下的精神世界和描写天地,而且还使部分作品程度不同地减损了历史穿透力和人物的民族本色乃至真实性。无形中妨碍了他们在塑造真正的中国军人典型,抒写真正的中国军人心态诸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与前者相反的是,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们还缺乏用当代意识来观照历史,用一种与现阶段民族进取品格相一致的军旅生活观念来审视农民军人的自觉性。换言之,即一种清醒的自审意识或自觉的批评眼光。这就使他们熟知中国军队的基本成分——农民这一先天优势难以发挥。反而常常在理想人物身上表现出与旧传统的熟练衔接,和与新观念的陌生碰撞——应该说,我们民族的“优根性”和“劣根性”都通过农民军人相对集中地体现在军队中。在我军草创时期“劣根性”的种种表现如“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等等(《参见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不仅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完成消除,相反只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愈加暴露或变相更生(如“当兵镀金”、“当兵吃亏”、“铁碗人物崇拜”、“农民英雄主义”、“现代军阀意识”、“清官治军”思想等等)。因此,农民家庭青年军旅作家们在大力强调发扬革命传统的同时,如果不能对那些非革命传统进行批评与扬弃,也就很难承载重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军人品格的历史重负。

发现差异,也就是寻找“合点”,通过差异的互参观照,寻找双方的互补结构。我认为,这种互补结构(或曰“合点”)之一就是中国农民的心理基础——

任何一个军人,都必定带有他本国、本民族、本地域的心理遗

传基因。这种遗传基因决定着他的精神气质、思维模式乃至行为走向等等，由此构成不同国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军人特点和差异。中国军人既推重项王的壮士气概，又崇尚周郎的儒将风范；既称道大智大奸的曹操，又彪炳大忠大愚的岳飞；既歌赞“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英雄豪气，又抒发“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凉情怀。同样是勇敢，却又很不同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即便仅从性爱道德入手，也很容易找出和西方军人的差别。——所有这一切，又都和我国的农民分割不开。中国历代兵源主要来自农村，因此，中国军人心理不可能挣脱农民文化传统的笼罩，质言之，中国军人的心理就是中国农民心理的折光。数千年的农民战争，形成了我国军人独特的战争观（“兵者乃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人生观（“大丈夫当提七尺剑建功立业，岂可与草木同腐”）、生死观（“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胜负观（“胜败乃兵家常事”、“不以成败论英雄”）、荣辱观（“士可杀不可辱”）、英雄观（“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等等，它就像一条幽邃的地下长河，涌动在中华民族意识的岩层里，流贯在每一个中国军人的血脉中。所以，只有深刻地研究中国农民的命运，理解中国农民的情感，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军人最基本的心理特质，也才有可能分辨良莠、鉴明优劣，在今天心理嬗递、观念演变和意识更新的大潮中，对其作出深层性的开拓和建设性的扬弃。

如是，就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总体而言，都应该清醒而坚定地立足于自己最熟悉的情感经历和生活领地，同时注重用历史眼光来观照现实，以当代意识去反思历史；从民族心理中提炼军人品格，在军人形象里传达民族之魂（就象《红高粱》通过农民武装的抗日故事，剥开民族精神的复杂内核，又象《第三只眼》经由军人生活的具体写真，达到民族心态的哲学抽象——以历史感获取作品的穿透力，以民族性扩拓作品的辐射力），在这四者的交叉点上，确立自己的文学整体意识，努力构筑起中国军人形象山系，并使之毫无愧色地耸峙在世界军事文学的漫长风景线上。